



**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

**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参考资料**

中国党校出版社



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

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参考资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建军 主编 —中国党校出版社

ISBN 978 -7 -88565 -685 -2

I. 国… II. 张… III. 参考 IV. D922.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182565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责任编辑：刘国强

责任校对：韩伟志

技术设计：张文池

出版发行：中国党校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书中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1092 16 开

印 张：104.25

字 数：1866 千字

书 号：ISBN 978 -7 -88565 -685 -2

---

如发现有印装错误 本印刷厂负责调换

## 第三章 经济调整与改革起步

本章主要叙述 1979 年至 1984 年国民经济调整与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国民经济调整是这一阶段经济工作的中心。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并取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创办经济特区两个重大突破。为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并取得一定进展。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加强党风建设,开展新时期的整党。

### 第一节 调整经济与探索新路

面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也由原定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实现小康。

#### 一、李先念赞同邓小平由陈云出任财经委主任的意见,并且主动提出给陈云当助手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国务院讨论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在讨论中,遇到许多难以确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成立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请陈云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向来很钦佩陈云,视陈云为教会自己管经济的老师,因而很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邓小平、李先念的意见为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和通过。

1979 年 3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任命陈云

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书长。这个决定在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到1980年3月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后,国务院财经委撤销。

在当时的条件下,由陈云出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这是众望所归。在具有伟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与会者的强烈呼吁下,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特别是为推动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实现和新时期经济建设一系列重大方针的确立,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对于自己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陈云在1979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就在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经委的这一天,陈云和李先念联合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当时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几点意见,明确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

陈云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

◆—————|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好。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

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 1979 年全国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工作会议于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开,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正式确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一致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 二、“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邓小平等先后讲话

中共中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后,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许多人习以为常,没有认识到调整有多么紧迫和必要;对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匮乏,大家也都习惯了,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和根源;许多干部和部门急于求成的情绪相当严重,对压缩基建规模迟迟下不了决心,即便是国家计委的一些同志,也对其过去制定的宏伟的十年规划恋恋不舍。其结果是,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调整,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总的说来成效并不理想。基本建设规模紧而不缩,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财政赤字加大。

在上述背景下,1980 年 12 月 16 日至 25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陈云、赵紫阳、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在会上讲话。

陈云在《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总结了建国 31 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指出:

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赵紫阳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阐明中央关于从1981年起进行大调整的决策。他指出,现在全国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又潜在着危险。如不对经济进行大的调整,整个经济就要发生危机,政治局势也难以稳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只能量力而行。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

李先念在《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指出,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作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的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概括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他肯定这几年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强调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即真正全面展开。不过调整的重心已不再是仅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更重要的是要摆脱过去那种高积累、高指标和高速度的框框。在调整过程中,中央提出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本着这一精神,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新的方针。这表明党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根本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在确定1980年国防费时,邓小平明确指示军队要服从建设大局。洪学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随先念、徐帅、聂帅及得志、韦国清、张爱萍等同志一起到邓小平副主席那里汇报研究。算来算去,最后小平同志把总后原来拟定的数额作了大幅度的削减。在确定1981年国防费时,小平同志在一次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不上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

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8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宣告完成。国民经济结构大体协调，农业、轻工业获得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 三、中央领导人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对经济发展战略也作了调整。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

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党和政府曾几次制定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部署，如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化、用15年“超英赶美”、在15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这些目标都非常美妙诱人，但又都遗憾地一一落空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肩负起历史的重托，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要“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应该说，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强调对此要有深刻认识。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陈云接着对中国的国情作了分析，指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



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说，总之，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就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和探索这条道路的任务，并确立了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概括了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必须看到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正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生产技术底子很薄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因为“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穷的国家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因而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就会较长，中国只能在这个低起点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去逐步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议论和研究，认为“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搞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把“实事”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找出它的规律。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指出：我们是一个有9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80%以上是农民。我们革命胜利30年了，但经济还很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低。我们的国家穷，搞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人民又要改善生活，这就是矛盾；搞现代化，用人少，而我们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这又是矛盾。“我们在这样的矛盾中来搞四化，这就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醒认识了现代化建设的落后起点后，对原定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就不能不重新审视。其结果，当然只能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坦诚地说：

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

“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提法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四、大平首相问邓小平：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陷入了沉思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并与他会谈。这一天离进入80年代只差20多天。

大平正芳对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的制订起过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他所设计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年倍增规划实施成功，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会谈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首相提出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四个现代化”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水准，通过怎样的步骤和途径来实现，当时在认识上还比较抽象和笼统。正因为这样，对于大平首相的提问，邓小平未能马上答出来。他吸着烟，深沉地思考着。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他蹭掉烟灰，注视着大平首相，缓缓地说道：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在这里第一次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化为达到“一千美元”的水平，进入“小康”状态。这实际是对过去设想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作的重要修改。小康目标的新概念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

来的。从此,中国老百姓体会和向往自己的生活,就有了一个亲近朴实的说法和目标。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在谈到他对大平首相提问的回答时说,“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邓小平分析说,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1000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3000多美元。我们现在只有二百几十美元,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如果我们的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

跟大平首相的谈话,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中国历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如果说邓小平与大平首相的谈话是首次与外宾谈起他对未来20年的设想,那么,1980年1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虽然还只是转述他与大平首相的谈话,但这是首次向全党提出了他的设想。他指出:要把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规划为上下两个10年来完成。因此,80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10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10年,在今后的20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小康水平”规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会议认为,“六五”期间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七五”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高,再后10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会议提出,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就被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和确定下来。十二大报告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

◆—————|

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了实现20年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的时期。

## 第二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的,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是逐步推开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说道,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起超过2/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又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 一、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斗争,以万里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斗胆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

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安徽省和四川省先走一步,对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87年6月,邓小平在跟外宾谈话时也说: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农业合作化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出现过几次,但每次刚一出现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1958年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一亿多人。广大农民亟待休养生息,安徽、四川显得尤为迫切。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



省农委经过反复调查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以省委文件的名义于1977年11月15日在安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被简称省委“六条”，主要内容是：(1)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2)加速生产发展；(3)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4)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6)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出现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份红头文件。这为后来安徽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主要内容有：(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地；(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特别是肯定了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对于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和上述两个文件，《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和6月13日分别作了报道。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这对本已十分贫穷的安徽农村，无异于雪上加霜。除长江、淮河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皴裂，树叶凋落。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灾民离家乞讨，一片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议上动情地提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讨论和激烈的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是一项大胆的决策，是给广大农民下的一场及时雨。这极大地调动了

◆—————|

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扭转了被动局面。特别是这一“借”,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动因。

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秘密达成包干到户的协定。但他们的秘密还是很快传开了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出名。而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后,凤阳人民讨饭就同凤阳花鼓一样,闻名全国。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特大灾荒后,凤阳人“走四方”更是达到了高峰。

与其坐等饿死,不如斗胆“包产到户”,哪怕为此坐班房也在所不惜。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饥饿中求生的办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终于迈出艰难的一步,闯入了禁区:“包”。1978年冬,“包产到组”的办法已在小岗实行。小岗全队共20户人家(包括两户单身),共115人。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又划分为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三户,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个组,但仍矛盾重重,人心不齐。在这之后的一天夜里,小岗生产队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分田到户,并赌咒发誓要按他们达成的三条保证办。这封保证书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关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20个农民在保证书上按了手指印或图章(17个指印,3个图章)。这份保证书的标点符号不规范,都是打上一个点,可以说是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几个错别字。而这正是农民写的协议。

他们连夜抓阍儿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分完了。

小岗的秘密还是很快就被外面知道了。但小岗顶住了巨大压力,并得以幸存下来。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多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一斤粮食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小岗人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事。

凤阳县委办公室当时写了一个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记叙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情况:

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藏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之果实;一边一把一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

◆—————|

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小岗一年大变,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自行仿效,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 三、《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的来信,一时群众中议论纷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仍是一大“禁区”,但也开了一条小缝,毕竟允许了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而事实上,“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搞起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他最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下一步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信中说,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为“张浩”的来信加了编者按,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这封来信和编者按。一时,安徽、河南等地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惶恐不安,好似灾祸将降临。



“张浩”来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信中的意见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思想倾向。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委的负责人座谈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会后形成了纪要,于4月3日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在这次座谈会上,围绕联产计酬、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是主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的办法。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对已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张浩”来信造成的混乱,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稳定农村政策。万里和中共安徽省委坚持不改变已实行的办法,并指示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回答“张浩”来信提出的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写的信和“编者按”给安徽农村造成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框框,不能硬要群众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了题为《发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读者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编者按”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为了表示是在讨论而不是定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也还登载了一篇肯定“张浩”信的来信。

这时还只是就“包产到组”的争论。但随后就开始了包产到户的争论。

#### 四、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引发激烈争论,华国锋听取汇报时没有直接表态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参加了会议的王日礼回忆了会议的情况: